

鄆城县历史沿革概述

文史科供稿

鄆城县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据传，在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代，尧想把治理天下的重任禅让给德高望重的巢父，但巢父不肯受任，便隐居在潁水沿岸（今鄆城县城南沙河岸），从此潁水易名隐水。因隐居水旁，所以隐又加“氵”成为“潁”，自此，这里便成为历史有名和引人注目的地方。

史载，少昊四世孙皇陶，以“偃”姓封国于此。“偃者”“鄆”也，“鄆”始有名；西周时，封子爵国于此，史称“鄆子国”；春秋时，在鄆境内为国有四，即：胡、赖、柏、安陵；为邑有五，即：召陵、不羹、棠溪谷、白、鄆；战国时为魏下邑；秦时，鄆境内设县有四，即：鄆、定陵、召陵、安陵；西汉时，鄆境内设县亦有四，即：定陵、召陵、鄆、西平；王莽新政时，改定陵为定城，改西平为新亭；东汉时，境内设征羌侯国和褒信县，更始2年曾建西平国和鄆国，但不久即废；东汉境内设县者有六，即：鄆、定陵、召陵、西平、征羌、褒信；三国曹魏时，设县有四，即：鄆、召陵、定陵、征羌；晋时置如曹魏，但唯有召陵征羌有据；后至东晋末年，为县仅有二，即：召陵、曲阳。鄆之废当在永嘉（307--313）之后；南北朝刘宋时，设县有二，即

召陵、曲阳；东魏时，设县有三，即召陵、曲阳、征羌，亦无鄆；北齐时设县如东魏；北周时，设县有二，即：召陵、曲阳；隋朝时，设县有二，即：召陵、鄆，並置道州于鄆（今城关镇古城村）；唐时设县如隋，复置道州，但贞观二年废道州，建中2年置潏州，贞元2年废潏州，元和12年7月置行蔡州，12月鄆城又属许州；五代、宋、元、明、清至民国，皆设县一，即：鄆城县。1947年11月，鄆城西部解放，1948年3月，曾设沙北县，8月废除此县，恢复鄆城县。

明朝“八角琉璃井”

闫春标

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鄆城东关“八角琉璃井”，远在明朝永乐年间，是很有名气的。根据鄆城县志，卷二十九，文征外篇三十八页记载：“城东古龙井，灵物依灵神，上宽敞方室，下圆蟠修鳞……”。“有绠不敢汲，千载终无浑，谁云潜无用，旱至能兴云，会看布阳德，奋延腾苍雯”。“八角琉璃井”，在那时众谓“神井”，即龙井或古龙井，又被人俗称“八角琉璃井”。

毛泽东同志早年路过 郾城的情况

李 辉

一九一八年，是全世界无产者都永远铭刻在心底的年头。苏联“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空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种决心推翻帝、官、封变革现实的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尤为强烈。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五号，蔡和森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从湖南到了北京。经过多方联系后认为：要组织好这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驻在北京来主持。在这方面，他的同学，最要好的朋友毛泽东最为合适。于是，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立即组织了二十多位青年学生，在六月份乘火车从湖南往北京去。大家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他们的领队。当火车行到郾城县漯河寨的时候停了下来（那时，漯河为郾城的一个寨子，现在的漯河车站当时叫郾城车站），因为紧靠车站的沙河发了大水，铁路的路基都被水泡松软了，火车无法行驶。所以，毛泽东便带领罗仲言（即罗章龙）、罗学谦、陈绍廉、欧阳玉生等二十多位同学下了火车，一起到车站的墙上去看

布告。布告上讲，沙河水势很大，要旅客们在这里静 心 等候，等大水一退马上就开车。火车站离漯河东寨门只有里把路远，毛泽东就让大家把自己带的包裹集中起来，派几个人轮流看护，大家也轮换着到漯河寨内边游览、边考察、边吃饭。

毛泽东、罗仲言、陈绍廉三人是一起到寨子里去的。他们看到：漯河还是一个土寨，寨墙有五、六尺宽，四周都有炮楼。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统治，寨子里冷冷落落的。由于他们三人都是南方人，从未见过北方的大自然，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挺新鲜的。他们三人围着寨子转了一周，用了半个多小时便转完了。出了东寨门之后，在寨子东南的一座小庙旁停了下来。那座小庙有桌子高（本地土地庙），庙里供着一个泥胎小神，庙后还有一棵大树。他们又看到：北方农民用骡马耕田，不象南方用水牛。这大概因为南方大多是水田，北方大抵是旱田所致吧。

他们回到车站后，在火车站停了一夜。第二天，水退的很快，但是路基被水泡松了，火车仍不能开。由于大家的心情都很急切，就把行李包裹整理成几担，找几个郾城人担着，步行到孟庙车站，又乘车北去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河南。

（注：此材料引自韶山毛主席纪念馆）

李先念同志视察郾城县空冢郭

李 炳 臣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对于郾城县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阳光照耀着空冢郭农业社一望无际的麦田，春风吹起了一道道墨绿色的波浪。在青年试验田里，一块块试验品种长势喜人，比大田的麦子又强几分。试验田旁边有几十个男女青年，正在手握铁锹，挥动银镐，深翻平整土地，干得热火朝天。人们的欢笑声，劳动的号子声，铁锹的翻地声，汇成了一支浑厚的劳动交响曲。

上午十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乘坐小汽车，来到了空冢郭的麦田。陪同李副总理前来视察的有：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吴芝圃、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中共许昌地委第一书记赵天锡，还有中共郾城县委书记于庆义等同志。李副总理下车来到麦田，一面端详着墨绿色的小麦长势，一面称赞干部和社员的劳动干劲大。

李副总理参观了小麦大田以后，又健步来到了实验田。正在深翻平整早秋实验田的农技站技术员王惠敏和她的同伴们看到领导同志前来视察，心情无比激动，干得更起劲。李

副总理来到王惠敏面前停了下来，向她致意。这时，杨蔚屏书记亲切地对王惠敏说：“你认识他吗？这是李先念副总理”。接着又指着吴芝圃同志说：“这是咱省吴书记”。此时此刻，王惠敏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和蔼可亲的李副总理又伸出手来向她问好。王惠敏见此情景，赶紧把工具一放，伸出发颤的双手，紧紧握住了李副总理那双温暖的手，一种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她激动地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早秋备播情况和夺取全年丰收的措施，李副总理听着不断地点头称赞。

在李副总理和王惠敏正在谈话的时候，吴芝圃同志从一个社员手里接过一把铁锹，跃身跳进二尺多深的土沟里，和大家一起参加了深翻改土劳动，大大鼓舞了社员的积极性。

李副总理看到他们这种实干精神兴致勃勃地说：“你们挖地这么深，空冢郭的人民今年可真要大翻身了”。王惠敏说：“感谢党中央和您的关怀”。

这时，农业社社长王国安同志赶来，向李副总理等领导同志汇报小麦的管理和预产情况。当李副总理听说计划小麦亩产一千斤时，亲切地问：“能够达到吗？”王国安满有信心地说：“能够！去年的麦子没有今天的稠密，麦杆又矮，长势差多了，还打了五百三十斤呢！”李先念副总理走到小麦大田和青年实验田间的排水沟旁边，见沟南边的麦子长势好，沟北边的小麦长势差，颇有风趣地说：“这好象江北和江南，看来还得江北赶江南！你们能赶上江南吗？”乡党委副书记朱松勤同志坚定地回答说：“能够！有党中央的支持和领导的关怀，我们一定能够赶上江南！”

李先念、吴芝圃、杨蔚屏等领导同志视察了麦田，都很

满意。李副总理对王惠敏、王国安说：“你们的麦子达到一千斤；给我写个信好吗？”他们兴奋地说：“我们一定给李副总理报喜”。

临别时，李副总理同王惠敏、王国安等一起照了合影像。

六月初，麦子丰收后，空冢郭社员以丰收后的喜悦心情，向李副总理送了喜报（注：落实当年小麦实产六百五十多斤，比上年实产增产2.4成。）

六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副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又亲笔给空冢郭全体社员写了祝贺信，全文如下：“亲爱的空冢郭社全体社员同志们：六月十五日你们寄来的喜报信和小麦样品收到了。你们的小麦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兴奋，我为你们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而祝贺！这样的辉煌成绩，一方面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另一面也是全体社员同志们共同努力苦干猛干的结果，希望全体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挥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不骄不躁，继续鼓干劲，更深入地、更细致地、更踏实地，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注意适当调整生产节奏，使苦干与必要的休整相结合，那么，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最后，我预祝你们今年秋季来个更大的丰收。”

中共鄆城党组织在二次北伐 沙河之役中

孟新安

鄆城，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的必经之地。地处豫中，京汉铁路纵贯南北，沙、湍、颍河横穿东西。尤其境内漯河镇，不仅是京汉线的一个车站，而且是沙河沿岸的重要码头。

1927年3、4月份，中路北伐军在克漯河、渡沙河、痛击奉系军阀胡（毓坤）荣（臻）二军的日日夜夜里，鄆城党组织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全力支持援助北伐军；北伐将士浴血奋战，野餐露宿，爱民如子，纪律严明，共同谱写了军民携手、团结战斗的颂歌。

积极准备 迎接北伐

鄆城素有革命传统和较好的群众基础。1925年前，鄆城车站（今漯河车站）就有了党的活动；在“五四”、“五卅”运动影响下，学运、工运均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党应从各方面准备战争”，“必须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中共河南省委认为鄆城农运至关重要，于1926年4月派汪涤源（商城武家桥人）来鄆城开展工作。4月18日，鄆城派三名代表赴河南省会开封秘密参加了河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参与了《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和筹备成立河南农民协会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制订工作。

该次代表大会推动了鄆城革命形势的发展。继鄆城车站党小组建立之后，1926年10月，中共鄆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也在漯河诞生，在其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据《中国农民问题》（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记载，此时全县已有一区六乡成立农协组织，会员1.5万人，其中红枪会会员5000人。县东韩纬主就是农运工作的突出代表，全村百十户，参加农协者达80多户，农运如同滚雪球，迅速由韩庄发展到附近的邓店、上坡、曾红庙等几十个村庄，会员达2000多人，波及上蔡、西平、西华等县。

1927年2月，鄆城党支部改建为县委。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进行清党，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不允许公开存在，县委对外挂的是国民党县党部的招牌。县委成立后，着重抓了三件大事：

（一）组织会、社，大造舆论，为北伐鸣锣开道。1927年2、3月份，首先在县城内组织了文化促进会，共产党员赵伊平、王修理、袁志远、胡济众（胡思普）、张仁甫（张尚法）、温世德及和绍仲等为该会的骨干力量。会内创办了“扶轮小学”、《扶轮》半月刊，组织了新剧团，以学校、

刊物、剧团为阵地宣传革命。共产党员马长法（确山人）等受河南省委委托，在城内北大街设立了文化书社，发行《苏俄视察记》、《帝国主义论理》、《共产主义ABC》、《湘江评论》等革命书籍，以马列主义唤醒民众，使各阶层进步人士做好了支援北伐的思想准备。

（二）、开办“党义训练班”和“农民训练班”为组建农民自卫军培训骨干。共产党员蔡永令（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特训班毕业）和甄光远担任教官，赵伊平负责教育工作。共培训学员118人。

（三）改编红枪会为农民自卫军。1920年前后，红枪会遍布郾城各地。县东南王马店（今属西平），县西南大刘、空冢郭，县北孟庙、老官田等尤为集中。其最大者有两处：一处以林中和为首，一处以蔡存彭为首。共拥有队伍8000人，枪支90支，打过土匪，与群众关系甚为密切。其会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直接遭受奉军的压迫和敲诈勒索，思想基础好，倾向革命，拥护北伐。至二次北伐之际，中共派特派员于树德和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来豫改编红枪会。其初是想先把红枪会收编为义勇队，而后改之为农民自卫军。但因时间紧迫，这样做太麻烦，便改变决定，即将义勇队的事完全交给战区农运委员会办理。老官田一带的红枪会，就是在此背景下，经过该村党支部（已于1927年2月由团支部改为党支部）的精心组织迅速联合起来，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的。为鼓舞士气，大造声势，在村东北角召开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其余各地红枪会和农民群众，也纷纷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其他民众团体。据1927年5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紧要新闻”报道，

“漯河附近有农团十万余人”，“歼灭奉军千余人，其中一个步兵旅完全溃散”。

化装侦察 攻克漯河

1927年3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的残部已土崩瓦解，其部将大多数投诚革命，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吴佩孚本人似丧家之犬仅带少数卫队逃往四川。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数十万军队则长驱直入，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地区。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逼近驻马店、遂平一带时，盘踞郾城、漯河的吴佩孚部将靳云鹗看到大军压境，形势急转直下，便有依靠北伐军的意念。我地下党组织为了人民免受战争之苦，积极策动靳部倒戈，终于促其秘密派代表与北伐军取得联系，公开宣布脱离吴佩孚，自成河南自卫军。靳云鹗部倒戈后，在漯河车站东门外广场召开了“河南自卫军成立大会”。大会开罢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派于树德为首的慰劳代表团，由武汉乘火车直达漯河，慰问郾漯人民及靳云鹗部队。当时的中共郾城县委以国民党党部名义于漯河寨内南街路东组织千人大会，欢迎代表团。

会上，县委书记谢梅村（1935年叛党）、县委委员张光灼、宁香山等带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奉鲁军阀”、“铲除土豪劣绅”等口号，高唱《北伐歌》、《国民革命歌》等。有人还自编了文艺节目，准备会后沿街宣传。其中一首快板这样说：“……奉鲁军阀真凶残，大街小巷胡乱窜。坐洋车，吃小饭，从来不给人家钱。‘妈的巴子’不离口，皮带常在手中掂……”。

大会正进行间，突然，大会主持人宣布散会。于树德让县委负责同志一同上了专车。火车刚刚开动，密集的枪弹便纷纷飞来。

这次袭击是吴佩孚驻在郾城的第八军干的。他们本来已跟靳一起宣布反吴，但又接受吴佩孚密令倒戈，趁漯河召开欢迎大会之机，在县城东小李庄过河攻打漯河车站，阻止专车南去。

但车站铁路工人拥护北伐军，竭尽全力掩护，一路大开绿灯，使专车安全返回驻马店。郾城县委同志经于树德介绍，跟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党代表彭泽廪接头并介绍了郾漯一带的地形、地貌和军事情况。

这时，奉系军阀大举占领郾漯一带，首先清理了漯河南北的吴佩孚残兵败将，沿河东西布防，并命令先头部队驻扎郾城西南间十村附近。彭、唐决定派郾城县委负责同志返漯，沿线进一步侦察奉军的军事布防情况。郾城同志接受任务后，绕道潜入间十，找到进步人士张家范（间十人，漯河文林阁书店经理）商谈如何越过奉军防线。张找来一位进步邮差，让县委负责人穿上他的邮差服，背上邮包，带些邮票，直入奉军营地。由于奉军将士长期离开东北家乡，思乡心切，都希望通信与亲人取得联系，十分欢迎邮差的到来。

县委负责人闯了一个又一个敌军营地，把沿途奉军的兵种、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一一进行了侦察，然后返回驻马店汇报。北伐军根据县委提供的情况，制订了作战方案，决定立即挥师北上。因熟知地情、敌情，当渡过洪河后，一举歼灭了驻防九空桥的两营骑兵约千余人。并将已毁的铁路节节修通，为攻克漯河扫清了障碍。

奉军指挥机关正洋洋得意、举兵南进之时，忽闻九空桥失利，便急忙改变计划，放弃漯河，由寨北门渡沙河，妄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

捷报频传沙河畔

五月二十日拂晓，战幕拉开。以郾、漯两城镇为中心，东起黑龙潭，西到十五里店，在40里长的沙河沿岸展开激战。奉军凭借其居高临下之有利地势，时时向北伐军进行俯射，并用飞机骚扰阵地。入夜则以探照灯照射南岸，并不断炮击，北伐军也猛烈还击。双方多次强渡沙河，袭击对方。在沙河两岸展开了持续数日的拉锯式争夺战。奉军曾几次在强烈炮火掩护下，从漯河东西两侧渡河，皆未得逞。一次，敌人从郾城东五里小李庄渡河，在福音堂登岸直达龙王庙，被北伐军全歼。北伐军也曾于万庄等处以小股兵力强渡，因众寡悬殊而退回南岸。25日下午，双方皆下总攻击令，战斗达到白热化。沙河面上，炮声隆隆，弹飞如蝗，冲锋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声闻数十里。水中浮尸举目可见，河水易色。沿河十几个村庄，郾城西南孟庄、南关、杨家、挂刀营、阴阳赵、十五里店、漯河附近小李庄、万庄、娄庄、丁庄、郭庄等变成了厮杀肉搏的战场。战斗一直持续到26日晚，奉军支撑不住，终于全线溃退，撤退到小商桥，指挥部移驻临颍。

战斗中，郾城人民及其由红枪会改编的农民自卫军，在县委领导、组织下，冒着枪林弹雨，挑茶送饭，救护伤员，帮助运输，向导引路，扰敌后方，配合北伐军作战。

北伐工作组，一行30余人，由闫叙敏带领，要通过奉军自北舞渡到许昌的一段阵地。蔡庄党小组直接派人护送过境，使其顺利到达目的地。在双方激战中，由于河水很深，摆渡伤亡很大，郾城车站铁路工人积极赶制“铁甲车”，顺铁路桥把北伐军送向北岸。

郾漯人民不仅做了大量后勤支援工作，还直接拿起武器上阵杀敌。当荣臻残部溃逃颍河渡口时，遭到了共产党员谢瑞珍率领的老官田农民自卫军的伏击，敌人抛下輜重、弹药落荒而逃。逃到新店北坡刘村附近，又碰上了当地几十个青年农民组织的地方武装……敌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奉军虽然败退，但又暗中派遣特务隐匿漯河，伺机破坏。共产党员宁香山察觉顺河街福音堂对门一家染房内，窝藏特务5人，立告北伐军予以逮捕，并搜出互相联系的证件——五文小铜钱五枚，经审讯。又于盐场破获敌电话机一部，特务2人。一敌人在洧河南岸马夫张渡河被捕。由于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和多方努力，迅速清除了隐患，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人民拥戴北伐军，北伐将士爱人民。奉军从漯河撤退的当天，北伐军携带武器弹药，肩挑行李、炊具进驻漯河及附近村庄，除部分驻寨内顺河街天主堂和靠近沙河岸的美国医院（今漯河市人民医院）外，其余均露营郊外。走到寨内龙王庙（今回民桥）的将士们在水坑旁捧着泥水解渴。从无一人打扰群众。

二次北伐已过去六十个春秋。但军民前赴后继、团结战斗的丰功伟绩，至今还在郾城人民中间广泛传颂。

冯玉祥在郾城招兵

于 国 旺

冯玉祥将军是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至蒋介石）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1913年8月31日，冯玉祥奉命来到郾城招募新兵。对此，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有详细记载，现录于后：“1913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命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7月29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鲜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到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的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

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纪律，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堂或空着的公所。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除在郾城招收以外，並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邱、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18岁到25岁，身高4尺至5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一年一年的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1600余名，不够两个星期就招足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延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选招上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帮，20岁；一名朱安庭，18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

“1938年我路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听他俩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俩算算年纪，不过40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

梁冠英传略

苏州民革供稿

一、家世和出身

梁冠英，名子超，1895年1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鄆城县问十镇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里。其父克勤，字让甫，“习诗书，通经义，而恬淡性成，不喜功名声华以儒而农，服田力穡之暇，则闭户家修，肆览群籍。”（《梁让甫先生德配李申夫人赞志汇录》）冠英兄弟姊妹共七人，帮助父母依靠种地生活，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冠英在十一岁时，才从族长梁灿先生读了两年《四书》，以后在家边耕边读。在他十八岁那一年，受到第六镇（相当现在的师）军队的无理欺负，同时看到他们那样的威武，因而产生了当兵的念头，也就在一年的秋季（即：1913年8月），冯玉祥在漯河招兵，梁冠英赤背投入了冯玉祥的部队，当上了二等兵。

二、西北军的戎马生涯

北伐前，冯玉祥在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有二十余万人，分驻在河北、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省。